

《十大古典哲学名著》丛书

孙子

〔三国〕曹操等注

袁啸波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哲学名著》丛书

孙子

〔三国〕曹操等注

袁啸波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哲学名著》丛书

孙 子

〔三国〕曹操 等注

袁啸波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4 字数15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5-1928-7

B·243 定价: 11.70元

出版说明

中国文化的独步世界的特点是，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的文化，都因异族入侵、国族覆亡、民族迁徙、战争乃至地理变化等原因而湮没，而中断，而改变其性质，只有中国文化保持了数千年长期一贯的无间断的绵延。中华民族既是十分尊重历史的民族，又是书写纸和印刷术的最早发明者，古代文化也因此能得到相对说来比较完整的保存和流传，中国丰富而浩瀚的载籍是世界文化的最大宝库。

人类文化的继承性使以后的文化发展都带着最早文化的烙印，后世的文化基本上是最早形成的文化的增殖和演变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本土文化的定型期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儒家六经的订定和另一文化支柱道家学说的确立；同时，与儒道分庭抗礼的墨家，本于道家而自成门户的名家、法家诸子，从治国经世之术升华而来的管子学派，从战争需要而来的兵家孙子学说，融会诸家、综贯九流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相继成出，各种体系各种学派的思想意识于是大备。后世各种学术思想，除了中世传入的印度佛家学说以外，无一不发脉于此；即使佛家学说在中土的流传中，其宗旨乃至教义亦莫不经受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洗染。因

此，先秦所定型的六经诸子之书，实为中国文化的泉源。

进而言之，则尽管这些最初定型的思想学说离开今日已数千年之久，但由于文化遗传和意识濡染的缘故，现代的中国人依然程度不等地接受这些古代文化的影响，有些甚至无意识地存在于人们的意绪和心态之中。因此，异域人要掌握中国文化，辨认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也不能不追根溯源，从中国先秦定型的这些思想学说中去寻求究竟。

现在从中国最早的典籍中，选出其最能代表中国各种学派内容，合之则能显示中国古代文化全景观的著作十种，辑成《十大古典哲学名著》。其中《周易》虽被定为儒家六经之一，但它系从远古占卜之书发展而来，先民的哲学意识本来就寄附于巫卜之中，所有天文、历算、自然现象和人事的变化之理，也莫不蕴藏在卦象的表意之中，经过古代人长期对爻义卦象的层层附益的解释，它已成为“通天人之际”的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的总汇；由于其涵容量之广和其奥义之古拙难辨，人们可以从理与数的各种角度进行探索，至今仍为诸家聚讼的热门，严格说来，《周易》虽列为儒家经典，但并非儒家所能独占，各家各派都可从中汲取智慧。《四书》由《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加上孔子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孔子以后战国儒家学派大师孟轲及其门生万章等撰述的《孟子》七篇，由南宋理学家朱熹編集而成。元明以后被定为儒士所必修的基本典籍，影响深广甚于群书。某种意义上《四书》也确可代表儒家学派的政治伦理哲学的宗旨。《荀子》撰人荀况虽亦被定为儒家的又一大师，但因其学说中颇有与战国道、法诸子的意见接壤之处，被韩愈评为“大醇小疵”，这也可以理解荀子

作为儒学大师是门庑较为开阔的思想家，同时也说明了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各种学派的相互影响。

与儒家思想同为中国文化支柱的道家，开宗典籍为《老子》一书，其书虽仅五千言，但书中所主张的天道观及清静无为阴柔谦退的思想却渊源甚古。《老子》的成书时代学术界历来意见不一，或谓春秋时，略早于孔子（马叙伦、郭沫若、唐兰等说）；或谓系战国时，应与庄周同时（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等说）；或谓成书更晚，当在秦汉之间（顾颉刚说）。三说中当以第一说为合理，惟古人之书，常为弟子后学所损益，窜入部分新见，遂致歧疑。《庄子》书后世与《老子》书并称“老庄”，然中世以前并不联称。司马迁论庄周虽谓“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但两者据说实有差异。要之，老子以天道喻人事，庄子则以人事喻天道；老子论阴阳刚柔变化，语多辩证；庄子则齐一死生物我，意近虚无。故班固谓道家“秉本执要，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因此，后世有以黄老之学取世者；而庄子则“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宋濂《诸子辨》），是超世嘲世的。魏晋以后，向秀、郭象辈大畅庄学玄风，《庄子》书才与《老子》书并为道家所宗，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庄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书当与《孟子》书的写定同时。但《庄子》书中亦有不少后人的增益。

其实，先秦时期与儒家对峙的并非道家，而是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墨翟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墨子》书中亦有其弟子及后学的增补。墨子主张节用、兼爱、尚贤、明鬼神、非命、

尚同、非攻，各有专篇。学者以为墨子尊夏法而非周制，其学出于上古质朴的平民思想，与儒家的重礼乐、崇宗法有异，书中《非儒》篇（今佚其上篇，或谓系墨子弟子所作以尊其师者，据毕沅说），对孔子学说颇有排诋，遂使孟子斥为邪说，力言“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杨朱之学，后果湮没；墨家学说，汉世以后亦几不彰，幸其书不绝如缕，至清代墨学始盛，但终不及儒道学说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广。

《管子》在先秦学说中出书最早，亦以儒家羞言齐桓晋文之事，以为其书专言权谋功利，未臻大道而漠视之。但刘向以为“《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管子》书是春秋诸侯纷争的所谓礼崩乐坏之时的“救时之宜”，所以提倡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之学。学者以为其学说源自周公治国之制，“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大抵不离周官以制用，而亦不尽局于周官以通其变”（赵用贤说）。可称为中国最早成型的哲理性政治经济学，而兵、法诸家的致用性的精神实均导源于此。

《孙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是哲理性与实践性兼具的战争科学杰作。孙武处于春秋末期，约与孔子同时。他本是齐人，齐景公时因乱奔吴，遂为吴将。齐国春秋早期称霸，《管子》书富国强兵的学说他虽未必亲睹，但其先人伐莒有功，齐国治兵攻战的方法与实践必为他学说的渊源所自。故对战争胜败的基本要素，如战争原则、方针、形式，都从具体升华为抽象，从实战上升为哲理层面，对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胜败等战争中的基本矛盾，都作了卓越精当的阐释，在

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孙子不但是中国的“武圣”，亦是世界所尊崇的兵学权威，所论虽本于古代战争的实践，但其原则却超越历史，具有普遍意义。

《韩非子》书总结了申、商刑名法术之学而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司马迁称韩子“其归本于黄老”，大概以其中《解老》、《喻老》诸篇将刑名法术之学与老子的道与德联系解喻之故。法家中申不害主术，商鞅主法，而韩非则术、法之外，又张扬以势，其学说是统治者控驭臣民的政治哲学。秦以后的历代王朝，或以黄老清静之学御世，或以儒家伦理政治之学治世，但无不杂用法家的刑名法术的方法和手段。韩非的议论中又颇含纵横家的气质，为谈士所默习，所以后世虽不张扬法家学说，但其潜在的影响仍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吕氏春秋》由吕不韦集众宾客所作，不成一一人，不能名一家，是以班志列为杂家。高诱称其“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备述儒、墨、名、法、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之言，而“以道德为标的，无为为纲纪”（高诱序），而大致以道家学说为主要倾向。不但综贯先秦诸家学说，书中亦有诸子书所未备的遗文坠简，虽未必能当先秦学说总汇之称，要可为先秦各家学说作一补充。以后西汉淮南王刘安集宾客纂成《淮南子》，即仿《吕氏春秋》之意。因此，举先秦要集，《吕氏春秋》亦不可废。

以上十种要籍，中国最早定型的古代学术思想已大致赅备，可称中国古文化的集萃，又是以后数千年文化的权舆。后世学者的汗牛充栋的著作中，疏解、发明、演绎、发挥上述十种典籍的，不知凡几；至于要认识和掌握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内容，是绝不能离开它们的。

这次编印这套书所取版本及校订情况，分见于各书的说明，兹不赘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5 年 5 月

前 言

《孙子》即《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兵书。它的作者是春秋末期著名军事理论和军事活动家孙武。孙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公元前512年，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吴王知其谋略过人，善于用兵，就命他为将。后来，孙武与伍子胥一起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成为当时强国之一，表现了卓越的军事组织才能。

《孙子》共十三篇，《形篇》以上四篇为阐说战争准备理论，《势篇》以下诸篇为论说战争实施理论，形成完整严密的战略思想体系，是一部战略理论奠基之作。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目的性特别强的社会活动，因而明确战略目标是其首要任务。孙武从历史和亲身的实践中看到战争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诸侯争霸中对社会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将会给人民带来不幸和灾难。所以他把安国保民作为唯一的战略目标，在书中屡次强调“自保而全胜”，提出重战、慎战，以确保“安国全军之道”，反对轻率用兵。

在重战、慎战思想基础上，进而阐说谋划战争全局的理论，即《计篇》中所说的“五事”（指“道、天、地、将、法”）、“七

计”。换言之，政治、经济、外交、天候、地理等五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对比敌我双方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等七方面的优劣是制定战略决策和判断胜负的依据。孙子对于战略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均有极其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为人们提供了统筹战争的理论武器。尤其强调以“道”为首的重视政治因素的观点，是我国古代兵家理论之特色。

孙子从保国安民总战略目标出发，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上的最佳选择。即不采用任何军事手段，而采取政治、外交、经济等方式使敌人屈服，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当然这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这就是中国古典的“威慑战略”。是孙子战略思想中一块瑰宝。

《孙子》作为一部兵书，揭示战争规律是题中之义。它总结出一套作战指挥原则，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致人而不致于人”（指战争不能被动地应付敌人，而要掌握主动权）；诡道制胜；因敌制胜；攻守兼用，因利制权；我专敌分，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等等，这些都是从哲理高度上概括出来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克敌制胜的诀窍，因此被后人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

《孙子》是一部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包含深刻内涵的哲学著作，处处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不迷信鬼神，反对在军事行动之前占卦问卜，而主张对敌我双方的各种客观情况作系统、周密的考察和研究，然后确定相应的对策，所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在重视客观

物质力量的同时，孙子也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计篇》中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他认为在战争中可以通过“示弱”、“诱敌”、“扰敌”、“怒敌”、“离间”等等办法来造成敌人的失误，也可以用“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势利导”、“攻其所不守”等方式来形成自己的优势，促使敌我双方优劣势的转化，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孙子》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原始辩证法思想。孙子认识到矛盾现象在事物中的普遍存在，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诸如奇正、虚实、众寡、劳逸、饱饥、远近、进退、治乱、勇怯、攻守、专分、利害等等，书中随处可见。他很善于将这一对对矛盾概念运用于对战争的分析 and 战术方式的设计上。例如在分析军情时，他说：“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引文中凡涉及矛盾概念的字下加圆点，下同）、“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讲战术方法时他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这些都是矛盾概念的巧妙运用。孙子不仅看到了战争中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还认识到矛盾也是运动的，其内部对立的两方面可以相互转化，比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通过引导这些矛盾的对立面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就能够使自己一步步战胜敌人，走向胜利。此外，孙子看问题的方法也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他善于仔细分析各种现象，并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既能够迷惑敌人，又能不为敌人所设的假象所蒙蔽。再者，他并不把战争看作是孤立、静止的现象，而是将它放在诸多与之有联系的因素中去作系统、全面的认识。综上所述，孙子一

书除了它的伟大军事价值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孙子》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都异常精辟而透彻，实用性又很强，因此，一直为历代军事家和思想家们所推崇并运用。在国外，《孙子》也受到普遍重视，享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美誉，先后被译成日、法、英、德、俄、捷克、意大利等十几种文字出版。在不少国家，《孙子》已成为军事院校的必修教材。现在，《孙子》的运用早已越出了军事领域，而在企业界、商业界、体育界等竞争领域备受重视，显示了它的广泛适用性和不朽生命力。

《孙子》成书于 2500 年前，其文字古朴简奥，颇难读懂，因而很早就有人为它作注。唐宋两代，注家蜂起，出现过许多单注或集注本。其中以魏武帝曹操、南朝梁代孟氏、唐代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代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等十家集注本对后世影响最大。

诸家在诠释文句的同时，还常常列举古代著名战例予以说明，有的还结合自己的用兵经验来发表独特的见解，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研读《孙子》都不无帮助。《孙子》诸家集注的版本，早期流传有明本和清刻本，以谈恺本和孙星衍校刊本最著名。解放后发现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清代及近代诸家所未见。这个本子脱误较少，与谈、孙本对校，有两者俱误而宋本独善者，也有两本脱漏而宋本独全者，如《军争篇》“此治气者也”句下谈、孙本漏刻李筌、陈皞、杜佑、梅尧臣、何氏等家全部注文及张预部分注文达 470 多字。因此本书以 1961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标

点,其中个别明显讹、舛、衍、脱处,据明嘉靖谈恺刊本(简称“谈本”)、清孙星衍校刊本(简称“孙本”)以及有关资料订正,为读者提供一个文字可靠的本子。

本书十一家注家次序基本按时代排列,可是也有例外。如注家孟氏,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南朝梁代人,书中却次于唐人陈皞之后;杜佑为杜牧祖父,又置于杜牧等四家之后。这种颠倒现象,清人孙星衍首先提出,并作校改。同时还指出杜佑从未注过《孙子》,其文是从《通典》中辑出。他认为十一家次序应为:曹操、孟氏、杜佑、李筌、杜牧、陈皞、贾林、梅圣俞、王皙、何延锡和张预。孙氏说法影响颇大,后世广为引用。但据近代学者考证,孙氏之说尚可商榷之处甚多。如据唐宋典籍关于李筌在唐玄宗天宝二年已撰书上献的史实记载,推算出李筌明显早于杜佑,因此,孙氏整理时将杜佑改置于李筌前,是铸成新错。又杜佑虽为杜牧之祖父,然而他本非注家,只是在《通典》内摘引《孙子》,略加训释,辑文非全注,疑原书辑者或从体例考虑,故将杜佑置于唐四注家之后,等等。因此,本次整理为审慎起见,对原书注家次序不作移改,以免产生新的错乱,有待于读者在了解宋本原貌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袁啸波

1993年9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卷上	1
计篇	1
作战篇	17
谋攻篇	27
形篇	43
卷中	52
势篇	52
虚实篇	64
军争篇	82
九变篇	104
行军篇	113
卷下	130
地形篇	130
九地篇	140
火攻篇	166
用间篇	172
孙子本传	184
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	187

十一家注孙子卷上

计篇 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李筌曰：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官，以断主客成败。故孙子论兵，亦以计为篇首。○杜牧曰：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王皙曰：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也。○张预曰：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或曰：兵贵临敌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曰：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安得不先计之？及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谿度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杜牧曰：《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张预曰：国之安危在兵，故讲武练兵，实先务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系于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轻行者也。○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贾林曰：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陈之地。得其利则生，失其便则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权机立胜之道。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曰不可不察也。《书》曰：“有存道者，辅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举，则死生存亡系之。○张预曰：民之死生兆于此，则国之存亡见于彼。然死生

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胜负之地，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审察乎？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谓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计远近，而求物情以应敌。○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贾林曰：校量彼我之计谋，搜索两军之情实，则长短可知，胜负易见。○梅尧臣曰：经纪五事，校定计利。○王皙曰：经，常也，又经纬也。计者，谓下七计。索，尽也。兵之大经，不出道、天、地、将、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计，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一曰道，张预曰：恩信使民。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王皙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而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孙子所次，此之谓矣。○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逆顺，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曹操曰：谓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众，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